

毛澤東與佛教

滿耕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前言

二〇〇三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爲此，大陸各地以上映文獻紀錄片《走近毛澤東》、發行毛澤東紀念郵票、全國毛澤東詩詞書畫大賽、還有各種以毛澤東爲主題的影像展、研討會以及圖書聯展等種種方式來慶祝紀念這位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六〇年代，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追崇達到了頂峰，他甚至成爲億萬群眾心目中的「救星」與「紅太陽」，人手一冊《毛語錄》[註 1]，胸佩毛澤東紀念章，高喊「毛澤東萬萬歲」的狂熱，使老一輩的人們依然記憶猶新，中國社會因爲毛澤東而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他的功與過至今仍然倍受爭議，但是這位倡導無神論共產主義領袖，由於從小受過佛教的熏陶，即使在實踐中學習並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仍然十分關注中國的宗教問題，他對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有過一系列重要而精闢的論述，制定的宗教政策在今天的大陸卻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探討毛澤東與佛教的關係，除了使我們重溫佛教的根本精神面貌之外，同時也讓我們更確切地肯定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佛教在經歷兩千年的東傳後，已經完全融入到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成爲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這個課題是值得我們來關注和研究的。

一、毛澤東信仰佛教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字潤之，筆名子任。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毛順生，節儉吝嗇，善於理財。母親文七妹，是個典型而又善良的農村婦女，她與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深受民間佛教文化的熏陶。文七妹對己節儉勤懇、對人寬厚仁慈，每逢荒年災月，經常送米送糧接濟貧窮的鄉親，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和甚深微妙的義理，在一個不識字的勞動婦女的身上得到了具體的體現。

毛澤東小名「石三伢子」的由來帶有濃厚的民間佛教色彩。由於文七妹婚後生下兩胎均不幸夭折，當誕下第三個兒子毛澤東，唯恐他再度夭折，於是文氏帶著毛澤東叩拜「石觀音」

爲「乾娘」，並爲兒子寄名「石頭」，喻意結實、長壽。因毛澤東排行第三，故名之「石三」。[註 2]接著，文氏又代替毛澤東向南岳觀音菩薩許願，並答應待毛澤東長大成人之後再去還願，此外，她發願吃「觀音齋」祈求菩薩保佑毛澤東平安長大。在母親的影響下，幼年毛澤東在放牛之餘，經常去石觀音前禮佛，並轉往外婆家探望，以感謝外婆的關懷和菩薩的保佑。說到石觀音乾娘，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二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立民先生在其住所對筆者敘述了毛澤東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首次回鄉，吃飯之前他對大家說，『請等一下我的乾娘（意指觀音）。』大約過了三分鐘左右，他又說：『我的乾娘不會來了，大家請用。』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觀音的尊重。」少年學佛的毛澤東，直接影響來自她的母親文氏，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道：

我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曾因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當時和以後，我們試過很多辦法想讓他信佛，……[註 3]

二、學佛母親對毛澤東的影響

文氏雖未讀書，但佛教思想對她影響極深。母親的心地善良和品行敦厚，尤其是對窮苦人極富同情心，毛澤東耳濡目染，從小也跟隨母親信仰佛教，他也經常效法母親的善行幫助他人。有一次，兩位衣著襤褸的老少要飯女人來到毛家。見此情景，毛澤東跟著母親二話不說進了廚房，母親往碗裡盛飯，毛澤東也在一邊幫忙。接著，文氏母子一前一後往穀倉走去。文氏撐開袋子，毛澤東則協助母親往袋裡裝米。還有一次，正在上私塾的毛澤東看到另一位同學因家貧沒帶午飯而挨餓，他主動把自己的飯分給同學，自己儘量少吃，放學回家後再補吃。這種情況連續發生幾天才被母親發現，文氏不但沒有責怪毛澤東，反而誇獎兒子做得對，並從第二天起，每天給兒子備好兩份午飯。因此，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訪問時，曾一再讚美自己的母親。他說：「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女，爲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人。」[註 4]也正是這位品德高尚的母親，佛教慈悲助人的精神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

反而父親毛順生的自私固執讓毛澤東感到失望。在毛家附近一個農民，曾收下定金把豬賣給毛父，幾天後毛父派毛澤東去趕豬時，豬價已漲。這個農民一直歎氣埋怨自己運氣不好，還說少了幾塊錢對富人不打緊，對窮人家裡卻是個大空缺，毛澤東聽後就把這樁買賣退掉了。十一歲那年，毛父要買進堂弟毛菊生賴以活命的七畝田產，毛澤東和母親都覺得應該設法周濟毛菊生渡過難關，不應該乘機買他的田產，對父親的作風不以爲然。爲此，毛澤東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用什麼辦法讓父親也信佛的問題，希望能扭轉父親的態度。[註 5]

作為普通的農村婦女，文氏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務，撫養兒輩。她待人接物，純樸善良。災荒年月，經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的人。平時文氏還虔誠地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的信念灌輸給孩子。十五歲那年，毛母生病，毛澤東向菩薩許了願，希望母親早日病癒，於是和兩個弟弟用竹杆加上躺椅製成一副轎子，抬著母親，走了兩百多華里，登上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九點九公尺高的南嶽衡山祝融峰，專程到南嶽衡山進香許願。[註 6]可見當時毛澤東是如此的虔誠。

也許當時毛澤東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親的言傳身教，使他從小同情貧弱，樂於助人。毛澤東經常和母親一起到附近的鳳凰山的佛寺裡去禮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薩像，也是依時按節燒香叩拜，從未間斷。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重返故居時，指著堂屋正中擺過神龕的地方對大家說：「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

「不殺生」在中國古代就甚為推崇，孟子曾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也。」不殺生更是佛教修證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歷代高僧大德紛紛闡揚，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在其〈放生文〉中說道：「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剛戮。」所謂「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於文氏反對暴力和殺生，毛澤東從小受到耳濡目染，因此「小時候常隨母親去廟裡，而且還學會了唱佛經，那時候他深信殺生是罪大惡極的」[註 7]。另外，與佛法吻合相應的毛氏家規對日後的毛澤東也影響深遠。[註 8]

正是這種慈悲觀念潛移默化不斷在毛澤東心中滋長，他雖然身經百戰，指揮大大小小的戰役，內心卻總是不失慈憫。跟隨他十五年的衛士長李銀橋說過毛澤東一生有三怕：一怕淚，二怕血，三怕喊饒命。「我見他第一次落淚，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親哭，他也跟著掉淚，命令醫生盡全力去搶救」。後來，毛澤東開始住香山的雙清別墅。同住在香山的將士們都聽慣了槍聲，此時耐不住寂寞，幾位警衛幹部便打起鳥來。毛澤東開會回來看見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顯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臉，喊起來：「拿走，拿開！我不要看。」並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說：「麻雀也是有生命的嘛！它們活的高高興興，你們就忍心把它們都打死？」[註 9]。據跟隨他上井岡山的陳士渠將軍回憶，毛澤東只在朱、毛紅軍會師慶祝大會上，被任命為紅四軍黨代表兼任第十一師師長時挎過一次匣子槍，「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身上帶過槍」。[註 10]

有一次，毛澤東與李銀橋拉家常時，李銀橋說他喜歡母親，因為母親心地善良對人寬厚，毛澤東說：「你母親一定信佛。」他說：「你說她心善嘛，出家人慈悲為懷。」[註 11]可見這位對待政治上的敵人從不軟弱，主張「己所不欲，施之於人」的革命領袖，但終其一生致力於救護癯獨孤苦與探尋人類大同之路，這又與佛教強調忍辱不爭、化解一切仇恨的主張，倒有幾分內在的溝通與契合。

一九一九年，毛母病故，在長沙任教職的毛澤東時年二十六歲，母親的去世令毛澤東極其悲痛，他長時間沉默獨對孤燈，守在靈前，以泣母輓聯來表達對母親哀思及對佛教的認同：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

長生學新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註 12]

離開韶山後，毛澤東在寫給同窗好友鄒蘊真的信中，又高度讚揚了母親的品德——世上共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而他母親是屬於最後一種人。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充滿同情心，樂於幫助他人。建國後，成為領袖的毛澤東仍舊繼承和發揚這些美德，他經常給父老鄉親和師友，尤其是生活困難者多次寄錢。還邀請他們到北京敘舊，設宴款待，送給許多禮物。而他自己則節衣縮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當儉樸。這些無疑是幼年受母親影響的緣故。

三、毛澤東佛學思想的啓蒙

在毛澤東求學過程當中，康有為、梁啓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其中又特別喜歡梁啓超那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再加之毛澤東最尊敬的老師楊濟昌對梁啓超也是推崇倍至，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很自然的接受了維新派思想。

梁啓超從事維新變法運動，在海外興辦報刊，廣泛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思想，在國內風靡一時。他認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為表決心，梁啓超又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在《新民叢報》連載四年的系列文章《新民說》，這對當時的社會，乃至「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黃遵憲在給梁啓超的信中說《新民叢報》是：「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大無過於此者矣。」胡適在《四十自述》裡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毛澤東則評價梁啓超「有登高一呼之概」。雖然《新民叢報》已經在一九〇七年停刊。十六歲的毛澤東在東山小學堂時，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訂本。青年毛澤東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使他開始了關於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思考。梁啓超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註 13]。

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中大力介紹西方的政治學、哲學和倫理學說之外，更不遺餘力地宣傳宗教，特別是佛教對改革者的激勵作用。他在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該報第十九號發

表的〈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直指「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該報第二十三號上發表的〈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時提出了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是無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等五點意見。這些正信的佛教思想在毛澤東腦海中開始萌芽成長。一九一三年冬，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寫道：「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也。」[註 14]在《倫理學原理》批註中，他更強調「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註 15]的態度，在知識與信仰兩者的關係時，他又指出：「凡知識必建為信仰，當其知識之時，即心以為然，此以為然之狀態，即信仰也。」[註 16]由此顯示，毛澤東對信仰是持有肯定的態度。

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五年半的學習生活中，梁啟超的文章和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可以說是絲毫沒有間斷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澤東曾將自己寫的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上，文章提出請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的想法，這表達了青年毛澤東對這幾位人物的由衷欽佩。

梁啟超的文體對毛澤東的文章風格也有長遠的影響，讀毛澤東成年以後的文章，仍可感受到梁啟超式的氣勢和文采。在第四號上的《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處，毛澤東還附加了一些批註：「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表明他當時對君主立憲和封建專制兩種國家體制的理解。從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從贊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主張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是毛澤東早期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梯階。更重要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深入接觸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主張從「變化民質」入手來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這個思路開五四時期主張改造國民性的先河，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持續了較長時期，在日後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會名中有「新民」二字，足見梁啟超對他的影響之深。

四、毛澤東與佛教人士的交往及宗教政策

毛澤東一生博學多才，結交天下名士，交往範圍極為廣泛，其中，與其詩文唱和者有之，與其相互共勉者有之，與其意見相左者更有之……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與佛教人士的交往，激發毛澤東在宗教政策上有更多的領悟與觀點。

從毛澤東的大量手稿中顯示，毛澤東和西藏之間的密切互動，與班禪喇嘛保持的良好關係，每逢新年他們都會相互道賀，一九五九年九月毛澤東還邀請班禪赴京參加國慶。[註 17]兩人禮尚往來，除了「贈牛奶分離器、擴音機、兩用無線電收音機等禮物」予班禪之外，毛澤東還「建議班禪每年可選送一些青年到內地學習，藉此培養一些建設西藏的民族的幹部」

[註 18]。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向班禪表示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爲佛學知識分子，並詢問班禪佛學院是否還需要增添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文化及一般知識的科目。此外，他又說：

佛學不可不學，辦了佛學院，兩年畢業，專弄政治這個辦法不行。得搞四年，專門拿兩年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是不行的。[註 19]

在佛教教育的立場，毛澤東除了肯定要有紮實的佛學基礎，甚至希望佛教能培養一些全方位的人才，這個看法追溯到今天，無疑是眼光獨到並且對佛教的發展是有長遠之計的。

同時，毛澤東也經常與達賴喇嘛通信，致贈過達賴「擴音機、黃緞、長白山人參、貂皮衣筒、相片等禮物」[註 20]，並表示「如果有需要，也給予協助」[註 21]。還說：「以後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夠有更多的人到內地各處參觀，便可以加強我們中國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的關係。」[註 22]等等表示對西藏的關切與友好之意。達賴在日後的回憶錄裡，曾描述他和毛澤東的交往情節，「總的算來，我至少見過毛澤東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會中，少數幾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會晤，除了翻譯樸錯汪結之外，旁邊沒別的人。不管在什麼場合，宴會或會議也好，他總是要我坐在他旁邊，有一次他甚至爲我挾菜」[註 23]。毛澤東與達賴的話題，主要圍繞在「如何將西藏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協調到最好的地步」[註 24]。毛還表示，「中國到西藏的整個目的是要幫助西藏人」，而且讚美「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等等。[註 25]令達賴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在兩人的談話中說了贊同佛陀的話：「他讚揚佛陀反種姓制度、反腐化、反剝削。他也提到度母——這是一尊有名的女神。」[註 26]言語之間表現得相當支持宗教。毛澤東在指派人員赴藏時，曾認真地對達賴說：「我派這些人去西藏爲你工作。如果他們不聽你的話，就讓我知道，我會把他們叫回來。」[註 27]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晶午，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給中央的電報中，曾請示對西藏各寺院及乞丐發放布施的數目和方法，很快便獲中央覆電同意。[註 28]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毛澤東特地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李維漢爲達賴、班禪赴京進行部署。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爲慶祝藏曆木羊年新年舉行的宴會上，向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的達賴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班禪說了祝酒詞。[註 29]看來，建國前後時期的毛澤東與西藏的關係上雙方互動非常良好。

當毛澤東成爲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後，仍十分關注中國宗教問題，對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有過許多重要而精闢的論述。他雖然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並不反對組織佛教聯合會，他說：

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那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註 30]

除此，他提出：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它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予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註 31]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同藏族人士的談話〉中，他對宗教態度非常開明：

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後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後信。在中國，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穌教的有八十萬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萬人；信伊斯蘭教的有一千多萬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幾千萬人；還有信道教的，數目也很大，約有一千多萬人。人們的宗教感情是不能傷害的，稍微傷害一點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別人強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險的。這件事不可隨便對待。就是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會有信仰宗教的。[註 32]

在多種場合中，毛澤東均表明了「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註 33]他甚至一再強調：「只要人民還相信宗教，宗教就不應當也不可能人為的去加以取消或破壞。」[註 34]可見毛澤東對宗教採取比較尊重和寬容的態度。

後來，毛澤東將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歸類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來處理。他認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加強這個決定，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綱領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把宗教信仰自由列為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之一。他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註 35]著眼於全局、著眼於群

眾、著眼於文化發展，是毛澤東觀察和處理宗教問題的出發點，建國後，他仍十分重視繼續正確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廣大信教群眾不僅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而且也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對此，一九五四年九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八十八條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爲了確實保護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對宗教界人士還實行了爭取、團結、教育的方針，以提高宗教界上層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愛國熱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毛澤東還將他的佛教觀主要歸結爲佛教文化論、優良傳統論、和社會主義協調論[註 36]，這「三論」名義上是毛澤東對佛教的理解，實際上卻是至今爲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導思想。佛教文化論把佛教視爲歷史文化遺產，視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優良傳統論進一步概括了佛教的本質和作用。毛澤東主張「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將宗教視爲一種文化而非一般的迷信，這是唯物主義者對宗教屬性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作爲文化的宗教，兼具有多種社會功能，不僅與宗教文物、宗教旅遊等相聯繫，而且與倫理道德、發展文化教育和公益事業等相關。這就爲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爲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提供了一個重要理論依據。

五、毛澤東對佛學研究與評價

很顯然，在宗教政策上，毛澤東並未對所謂的唯心主義佛教採取一概排斥與否定的態度，而是尋求其合理的核心與民主性的精華，因此，他對宗教文化的主體結構如寺廟、詩文、典籍等更是給予重視與研究。毛澤東意識到，建國初期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重要指導意義，同時尊重人們宗教信仰也有利於對社會安定產生積極的作用。

在毛澤東看來，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宗教文化涵蓋哲學、思想史、語言、文學、藝術、繪畫、天文、歷史、醫學、建築等方方面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雖然在一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學與宗教往往混雜在一起，但並不影響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廣泛群眾性及其文化屬性，相反，他深信，只有透過瞭解宗教文化並對之加以適當地改造，一定能建設起適應社會的新模式。假若對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態度，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遺產，損害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這點原則毛澤東把握得相當正確。

重要的是，毛澤東認爲要懂得宗教文化，首要就是研究何謂宗教。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與班禪的談話中，毛澤東「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爲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註 37]。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的批文中，針對研究宗教、批判神學問題專門寫了一段批語：

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註 38]

爲了進一步瞭解宗教，毛澤東專門認真地讀過有關佛陀生平的故事，也獲得了一些啓發。他提出的論述非常有趣，形容釋迦牟尼是「從被壓迫民族中產生的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爲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他認爲在解除人民群眾壓迫和痛苦這一點上是和共產主義有相同之處。因此，希望信佛教的人和共產黨人合作。

據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逢先知回憶，毛澤東重視宗教問題，特別重視佛教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他都讀過。對於禪宗學說，特別是六祖惠能大師的思想更爲推崇，他認爲「六祖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勞動人民的」[註 39]佛經，正因爲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得佛教在中國廣爲傳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還專門談到過惠能，說惠能「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註 40]

毛澤東外出還攜帶著《六祖壇經》，關於六祖禪宗的故事，他和擔任秘書的林克說過多次，對惠能評價極高，特別讚賞他勇於革新的精神，說他不要教條、不要清規戒律，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爲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後世將他的創樹稱之爲「佛學革命」。

當時毛澤東還脫口背出惠能所作的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精神毛澤東說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而且他還給林克專門解釋了這首偈的背景，說惠能本來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幾乎不識字，但他的悟性好，在聽人誦《金剛般若經》後，發心學佛，投禪宗第五世祖弘忍門下，弘忍便將禪法秘訣授於他，並付法衣，這也就是，「繼承衣鉢」的出典。關於這個故事，毛澤東提到過多次。毛澤東對《六祖壇經》的評價極高，尤其「高度評價六祖對主觀能動性的發揚。他說：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能敢於否定一切。有人

問他：死後是否一定升天？他說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他的學說盛行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年亂世，人民無所寄託，大為流行」[註 41]。他也曾對班禪大師說過：中國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為「經」的，就僅《壇經》一部。有一次，毛澤東和周穀城談論哲學問題，說到胡適寫哲學史，然後突然對中國至彼時尚無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遺憾之情。[註 42]

縱觀惠能一生，從他自幼辛勞勤奮，在建立南宗禪過程中與北宗禪對峙，歷盡磨難的經歷，到他不屈尊於至高無上的偶像，敢於否定傳統的規範教條，勇於創新的精神，以及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等特徵來分析，在這方面與毛澤東一生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行為中，頗多相通之處，所以為毛澤東稱道。毛澤東談吐幽默詼諧，有些話含蘊頗深，很值得回味，不能說與禪宗全然無涉。

正因為對《六祖壇經》的喜愛，舉凡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現代佛學》期刊也成為毛澤東經常看的雜誌。因毛澤東常研佛理，對獻身於宗教的人物常懷敬意，毛澤東說過：「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經，其經歷的艱難險阻，不弱於中國工農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帶回了印度佛教的經典，對唐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更讚歎「鑒真和尚，說他六渡扶桑，雖然前五次都失敗了，但他不屈不撓，終於到了日本，對於佛教的東漸，特別是中國佛教及文化貢獻最大」。[註 43]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給何凱豐的信，信中寫道：「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又有一次，毛澤東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中寫道：「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致學友蕭子升的信中說道：「我『無他長處，』惟守『善與人同』、『取人為善』二語。故己有得，未嘗感不告於人；人有善，雖千里吾求之。」從毛澤東喜歡在談話寫信中經常引用佛門用語可以發現，佛教文化對毛澤東和他爾後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直認為佛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毛澤東，這個觀點他始終都沒有改變。一九五二年，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過程中，毛澤東在審閱草案時，在協會的宗旨中增加了「發揚佛教優秀傳統」八個字。[註 44]此舉不僅表明了毛澤東對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支持態度，也反映出毛澤東對佛教在中國文化傳統地位中的肯定立場。

在佛教義理方面，毛澤東表達了求學的渴望。一九二〇年，他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表示要研究佛學，他經常感到「常識不具，難語專攻，集攏常識，加以條貫，便容易達到深湛。……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並特別囑咐黎錦熙寄些語言文字學和佛學的書給他。[註 45]

毛澤東還會以《金剛經》中所學給研究佛學的趙樸初出考題。一九五七年趙樸初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見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問趙樸初：「佛教有沒有這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初，是名趙樸初呀！」趙說：「有」。毛再問：「爲什麼？先肯定，後否定？」趙又說：「不是先肯定，後否定，而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多年後，趙樸初想起那一次未談完的問答，覺得也許以佛教緣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對補充毛澤東先前所想講的話有所幫助。[註 46]

工作之餘，毛澤東非常關心佛學研究的情況。當讀完任繼愈縮寫的欺騙佛學論文後表示：「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同時又指出任繼愈的不足之處：「只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理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對的。」[註 47]畢竟毛澤東對任繼愈還是很器重的，一九六四年，任命任繼愈籌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並長期擔任所長一職。隨著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和佛學研究的推動，造就了當今楊曾文等著名的佛教學者。[註 48]

毛澤東對佛教寺廟有著濃厚的感情，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二十四歲的毛澤東邀同蕭子升和同學蕭蔚然徒步進行了一次遊學。在遊歷湖南五縣時，曾掛單在寺院兩宿，並受到方丈及百餘僧人的熱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實的體驗使毛澤東難以忘懷。在日後的革命生涯中，只要一有機會，毛澤東總喜歡到寺院進行參訪。一九四八年春天，毛澤東由地方幹部陪同，來到五台山台懷鎮塔院寺。毛澤東觀看了寺廟文物，巡視了塔院寺、十方堂寺和蒙藏合作社等處，一路上他親切地與僧人交談，關心他們的生活和佛事活動，並勉勵地方幹部一定要保護好文物，要忠實地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團結愛國僧人，把五台山建設好。毛澤東在五台山路居，雖僅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內方丈院中，至今還設有毛澤東路居陳列館。

此外，毛澤東曾經遊歷過香山寺，回龍山，還遠至仰山慧寂的得法處滄山密印寺拜訪參觀，翻閱了寺藏的各種佛經，與方丈討論了佛理。

一九四七年，毛澤東和警衛隊的人員一起去駐地附近看白雲山寺，他捨棄騎馬而選擇走路，認爲如此到寺廟才算虔誠。可是當他看到當地縣長對白雲寺顯得一臉茫然，並不重視的時候，毛澤東毫不客氣的批評他：「這是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你是守著元寶當石頭啊！」進廟後，毛澤東觀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建築，特別注意到牆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畫，像帶領他們參觀的老和尚詢問壁畫所描繪的佛教經傳故事，並感慨的對老和尚說：「這些東西都是歷史文化遺產，要好好保存，不要毀壞。」參觀完後，毛澤東又指示縣長：「縣裡要撥點經費，把廟修一修，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

還有一次，毛主席在延安出門散步，對勤務員李銀橋說：「我們去看看佛教寺廟，好不好？」李銀橋說：「那有什麼看頭？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嗎？那是名勝古蹟，是歷史文化遺產。」[註 49]

綜上所述，毛澤東邁向人生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以對於慈悲博大的佛教的虔敬與認同為主要標誌的。雖然他說自己是個無神論者，在他的生命中，仍然不斷追憶其早年對於佛教的信仰。縱使這時的毛澤東已基本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對自己早年的行為稱為「迷信」，但他這樣再三地反覆談論追憶，也許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向人們透露這樣的資訊即早年的宗教生活的熏習給他的一生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六、毛體與懷素

毛澤東是詩人，又是書法家。他的詩詞，絕大多數是用毛筆書寫的。這位一生都由毛筆作伴的詩人，在書法造詣上更是博採眾長，氣勢磅礴。獨特的字體縱橫瀟灑，斜正呼應，錯落有致，一氣呵成，成為別具一格的「毛體」書法。

毛澤東青少年時早年先學魏碑、顏真卿，後承蘇黃，轉而又學鄭板橋、王鐸，最後苦練張旭、懷素的草書，這些培養了毛澤東紮實的書法功底。在歷代書法大家中，對毛澤東影響較大的是唐代僧人懷素。懷素的書法如筆走龍蛇，飛轉圓動，神采飛揚，在我國草書發展史上，達到了草書發展的最高峰，是位純粹的草書大家。懷素在其《自敘帖》開頭說：「僧懷素家長沙，幼兒事佛，經禪不暇，頗好筆翰……。」懷素尤其喜愛草書，自稱得「草聖」張旭的三昧真傳，被譽為「草書天才」。《續書評》對懷素有了更具體的描寫：「釋懷素，揮毫掣電，隨手萬變，素以狂草得名。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另多變化，而法度具備。」同時代的名流李白、錢起等都曾寫詩讚美過懷素，李白在其《草書歌行》中極推許地說：「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

據當時中辦秘書陳秉忱回憶毛澤東掌握書法時的用心：「……『二王』帖及孫過庭、懷素的草書帖，則是時常披閱。毛主席不但博覽群帖，而且注意規範草書，如古人編輯的〈草訣要領〉和〈草訣百韻歌〉等帖。」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請將已存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我，包括若干拓本……。」[註 50]這封信表明了毛澤東攻草書的決心。毛澤東通過精讀各種碑帖、臨帖，尤其是草書「顛張醉素」的法帖，汲取精華，心摹手追，再加上他本身的領悟力，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透過毛澤東的墨跡，看出毛澤東的草書師承張旭、懷素，並加以創新，達到了一種隨心所欲、揮灑自如的境界。例如，毛澤東手書陸遊《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字跡連綿，如一片煙雲，中鋒建骨，側鋒生姿，意筆相從，豪邁飛動，是典型的學張旭的例子，而手書李白〈憶秦娥〉（蕭聲咽），硬毫走筆，點畫簡約，連綿跌宕，雄奇超逸，是典型的學懷素的例證。因此，曾做過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說：「毛澤東的字是學懷素的，寫起來很有氣魄。」[註 51]從百幅真跡來看，毛澤東的書法和詩意極為融洽，渾然一體，豪邁、蒼涼、委婉、激越，風雨雷電、水流花開、天地肝膽、大澤龍蛇，博大的心胸、純美的詩情，毛澤東憑手中的長鋒狼毫筆，在尺幅間、時空中，留下了人間正道、男兒意氣、雲水襟懷和審美理想。

毛澤東作品深富時代氣息與創新精神，個人風格為同代之冠，屬於中國現代書法的代表人物。[註 52]他，達到「造我神韻，有我無人」的藝術境界，保存下來的毛澤東的書法有題詞、信件、手書詩詞等多種形式，字體有楷、行、行草和草等，而以行草特別是草書成就最高。

從佛教文化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所瞭解的佛教和談及對佛陀、佛典、僧人、甚至對佛教的看法是客觀而豐富的，因為他準確把握了佛教的特色與根本精神。他的這些言論從側面反映出毛澤東與中國佛教文化的深厚關係，同時又是對佛教文化的提煉、發展和普及的一種肯定。從某種意義來說，毛澤東思想根源來自於中國這片佛教文化底蘊深厚而又富饒的土壤。他善於吸收消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善於把深刻的道理以中國人接受的形式加以表述；他又善於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人文之因根，不以時移，不從地遷，不隨風流，不因物化，永放光華於世界民族之林。

後記

筆者在北大就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承蒙家師指導，閱讀了大量有關毛澤東與佛教的參考書籍和研究資料，寫作期間，南京大學王月清先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北大哲學系資料室王軍女士在借用參考資料時給予了諸多方便，另外如真法師依據王興國的著作列了一份毛澤東與佛教的簡表。二〇〇〇年仲夏寫成本文後，一直未急於發表。時隔三年多，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上海公演之際，家師再次關心寫作一事，並囑咐投稿普門學報。特謹此一隅，向各位師友一併致謝。

【註釋】

[註 1] 《毛澤東語錄》是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世界上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書，發行累計五十億冊，覆蓋了全國流向 了世界。其中，國內外各種版本多達五百餘種，僅外文版本就四十多種。

[註 2] 直至毛澤東離開韶山前，大家都管叫他「石三伢子」或「石三少爺」。毛澤東喜歡石頭的堅硬性格，自然喜歡「石三」這個乳名。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澤東在寫給廣州國民黨總部工作的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說道：「此信託人帶（漢）寄上，因檢查極厲害，來信請交毛石三，莫寫毛澤東。」一九五一年二月的一天，彭大將軍從抗美援朝前線回來向毛澤東主席會報工作時，毛澤東風趣地說道：「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名字叫石三，我們同是兩塊石頭。」

[註 3]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十頁。

[註 4] 同 [註 3]，第六頁。

[註 5]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第一〇九頁。

[註 6] 《周恩來選集》，第三三二頁。

[註 7] 《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昆侖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八一頁。

[註 8] 毛氏家規頗嚴，族譜中有記載著家訓十則：一、培植心田，二、品行端正，三、孝養父母，四、友愛兄弟，五、和睦相鄰，六、教訓子孫，七、矜憐孤寡，八、婚姻隨宜，九、奮志雲窗，十、勤勞本業。另有家戒十則：遊蕩、賭博、爭訟、攘竊、符法、酗酒等等。

[註 9]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第四十二頁。

[註 10] 《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三十二頁

[註 11] 《走向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第三十六頁。

[註 12]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一一頁。

[註 13] 同 [註 5]，第一一三頁。

[註 14]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五九一頁。

[註 15] 同 [註 12]，第二六三頁。

[註 16] 同 [註 12]，第二二八頁。

[註 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五〇二頁。

[註 18] 給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一九五四年四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四九一頁。

[註 19] 陳晉，〈毛澤東與中國的佛道教〉，《瞭望》雜誌（一九九三年）第八、九期。

[註 20] 給達賴喇嘛的信，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同 [註 18]，第一一一頁。

[註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三二九頁。

[註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五八四頁。

[註 23] 康鼎譯，《達賴喇嘛自轉——流亡中的自在》（台灣：聯經出版實業公司，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第一〇六頁。

[註 24] 同 [註 23]，第一〇七頁。

[註 25] 同 [註 24]。

[註 26] 同 [註 23]，第一〇九—一一〇頁。

[註 27] 同 [註 23]，第一一〇頁。

[註 28] 同 [註 21]，第四三六頁。

[註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四十六頁。

[註 30]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三九頁。

[註 3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一〇九二頁。

[註 3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第四頁。

[註 33] 同 [註 22]，第五八三頁。

[註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〇〇頁。

[註 35] 同 [註 31]，第一〇七〇頁。

[註 36] 徐蓀銘，《世紀佛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第三頁。

[註 37] 余湛邦，〈張治鍾將軍隨同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的日子〉，載《團結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註 38] 關於加強宗教研究問題的批語，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四七〇頁。

[註 39] 同 [註 19]。

[註 40] 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一二頁。

[註 41]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的講話，見《毛澤東與佛教》第一一二頁。

[註 42]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林克談話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註 43] 同 [註 42]。

[註 44]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

[註 45] 同 [註 14]，第五九一頁。

[註 46] 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序言》（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註 47] 同 [註 40]，第一〇四頁。

[註 48] 楊曾文，《我的佛學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一九九八年二月）。據楊曾文敘述：「一九六四年初各個研究機構和大學正在開始招收研究生。我當時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五年級中國古代史秦漢史專業的學生，本想報考歷史研究所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生，經系領導和我的指導教師田余慶先生的動員，便改報考湯用彤教授的研究生。然而在考試結束不久，尚未發榜的時候，湯先生因病與世長辭。正在此時，經毛澤東主席批示，以北京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研究室為基礎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因曾報考佛教學研究生的關係，畢業後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佛教。在此至今，除了參加『四清』以及『文革』動亂的時間之外，一直從事佛教的研究。」

[註 49]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光明日報》。

[註 50]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註 51] 見《書法叢刊》第十九輯《田家英專號》。

[註 52] 俞建華，《遊雲驚龍——書法藝術鑒賞》。

【參考書目】

- 1.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
-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至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 3.《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
- 4.甄不賈，《毛澤東談佛論禪》（「希望」，一九九二年）新總第二期。
- 5.陳晉，《毛澤東與中國的佛道教》，《瞭望》周刊（一九九三年）第八一九期。
- 6.《毛澤東評點古今詩書文章》（紅旗出版社）。
- 7.譚玉琛主編，《毛澤東與黨外人士》（河北人民出版社）。
- 8.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
- 9.周樹志，《毛澤東哲學思想史》（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10.譚邏松、張其俊編著，《毛澤東的幽默故事》（同心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 11.徐中遠，《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
-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輯，《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 13.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月）。
- 14.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15.張孝評，《毛澤東文藝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西安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16.《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 17.劉廣東，《毛澤東倫理思想》（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
- 18.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研究室，《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 19.陳葆華主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評述》（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20.《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 21.《毛澤東百周年紀念》上、中、下（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22.張靜如，《毛澤東研究全書 一一六卷》（一九九七年十月）。